

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编 万斌

朴学大师

孙诒让传

李海英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朴学大师

孙诒让传

·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朴学大师:孙诒让传/李海英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8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万斌主编)
ISBN 978-7-213-03527-2

I. 朴... II. 李... III. 孙诒让-传记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5100 号

朴学大师——孙诒让传

李海英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176516
责任编辑 章 依
责任校对 叶 宇
封面设计 池长尧 殷 瞻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19.5 万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3527-2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万 斌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

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期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顗、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

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赟、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 20 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 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目 录

第一章 书香门第	(1)
父孙衣言	(2)
骨鲠叔父	(10)
第二章 读书游历	(15)
侍读访书	(15)
椎拓碑铭	(20)
第三章 交游广泛	(23)
父辈交游	(24)
金石同道	(44)
温州乡贤	(52)
朝廷大员	(56)
维新人士	(70)
革命党人	(73)
第四章 关心时政	(90)
晚清思潮	(90)
政治观念	(96)
第五章 朴学大师	(108)
学术成就	(108)
学术溯源	(165)

第六章 教育救国	(189)
温处学务	(190)
筹措经费	(202)
其他方面	(210)
第七章 地方实业	(227)
开矿保路	(227)
因地制宜	(231)
结 语	(236)
孙诒让大事年表	(243)
参考文献	(253)
后 记	(259)

第一章

书香门第

道光二十八年(1848)八月十九日巳时,孙诒让出生于浙江瑞安潘垓茂德里,即今之浙江省瑞安市陶山区潘岱乡砚下村。先赐名效洙,又名德涵,后正名为诒让;因是家中次子,所以字仲颂,又作仲容、中容。成年后曾自号籀廬居士,别署荀羨等,曾用室名述旧斋、擅艺室、经微室、一盂庵、五凤砖研斋、百晋精庐、百晋陶斋等。孙家祖籍福建长溪,五代时迁居浙江瑞安集善乡的盘谷村(今名潘垓),世称盘谷孙氏。据说祖上以殷实、好义闻名乡里,大屋连楹绵延,村中人为避雨,都喜欢在其屋檐下行走,故而其村得名檐下村。时过境迁,到孙诒让祖父持家时,大屋连绵的盛况已不再,但孙家二进十一间大房在那一带仍然很气派。

孙诒让出身书香门第,曾祖和祖父时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曾祖孙祖铎,9岁能属文;祖父孙希曾,“弱冠时读书郡城”,交游名士,“衣服都雅,有游闲公子之风”。后虽家道中落,兼且困于举业,遂不复出,但仍“家居好学,尤善书,手抄书辄数千纸,家中所藏书率多丹黄云”^①。同时,也将读书求进的希望寄托在两个

^① 孙廷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以下简称《父子年谱》)

儿子孙衣言和孙锵鸣身上。

孙衣言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是孙诒让的父亲,赐名克绳,字绍闻,号琴西,后自署逊学老人。孙锵鸣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赐名克昌,字韶甫,号渠田,晚年自号止园老人、止庵、退叟。在兄弟两人只有四五岁时,孙希曾就亲为启蒙,“口授之经”,“督课之甚严”。加之兄弟两人天资聪颖,“求进之志高出群辈,每一艺成,兄弟交相评论,必求称心而后已”,青少年时即以邃学工文超逸流辈。18岁时,孙衣言县试第一,孙锵鸣第五;后者17岁补县学生员,所作“东风吹梦断,芳草已离离”被学使陈用光赞为“有名家笔意”。府试时,孙锵鸣第一,孙衣言第四。当地有人赞叹说:“少年兄弟一齐出头,乡里荣之,实我邑自来所未有。”在孙诒让出生前后,父亲和叔父在科举路上已是捷报频传。道光二十四年(1844),孙衣言中举人,时年30岁;道光三十年(1850)中进士,时年仅36岁。与哥哥相比,孙锵鸣的仕途似乎更为顺利。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人,时年19岁;道光二十一年(1841)中进士,年仅25岁,两次高中均比兄长早9年。像他这样年纪轻轻即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为入清以来200年温州学人中的特例。后来兄弟二人又先后擢任翰林院侍讲、侍读,同官馆阁,一时在乡里传为佳话。多年后孙锵鸣仕途坎坷出任南京钟山书院教习一职时,尚有人赞其“君家兄弟世间无”。

孙家兄弟无论考中进士之前,还是供职翰林院,担任地方官职,或者受聘为书院主讲,甚或告老还乡、赋闲在家,不管得意还是失意,始终手不释卷。不仅闲暇时以诗文自娱,还以振兴永嘉学派、匡救时弊为己任,表现出学者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父孙衣言

先说孙诒让的父亲孙衣言。道光二十二年(1842),孙衣言

28岁,还是一介布衣,得知清廷主政的穆彰阿与英军订立《南京条约》,悲愤已极,作《志愤诗》12首,表现出读书人强烈的爱国情怀。咸丰二年(1852),即中进士后两年,孙衣言被授翰林院编修一职,一年后晋升实录馆协修、纂修,与修《宣宗实录》,自己编《夷务书》,成稿百卷。是年,又充国史馆纂修。他自己也用诗文记录了当时在国史馆校讎编辑的忙碌场面:“四门谈史即色变,今者迁固何其多。上堂朱墨坐云雾,左史右史肩相摩。太仓食米尽十斛,便许校书入天禄。”^①咸丰五年(1855),孙衣言任上书房行走,为惠亲王绵愉的儿子们授读经史。当年,又充咸安宫总裁,文渊阁校理。两年后,又除翰林院侍讲,并充文渊阁直阁事,登阁观《四库全书》,还特别留心阅览四库馆藏的温州先哲遗著。这段时间里,孙衣言的身份是文学侍臣,所从事的工作使他免不了天天与文史打交道。比如,因为编《夷务书》出色而被赏,加五品衔,时间是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十一日。在这段时间里,孙衣言利用闲暇时间校读了大量的诗文著作,单是《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中提到的就有《古诗选》、《惜抱轩集》、《归震川集》、《元遗山集》、《汉书》、《史记》、《韩昌黎诗集》等多部。并且,对有的诗文集校讎过不止一次,如《韩昌黎诗集》,在孙延钊所作的年谱中就曾有多次校订的记录。从《史记》的校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衣言治学的严谨态度:

余既从定甫借录所传归、方评本,复索其初录本校之。初录本为明南监板,原有方侍郎三色评点,邵位西以为洪稚存传录者。定甫得之,而从梅伯言郎中借所录二色评本,并写于上。今取以相校,则定甫后录本尚有缺误。又方本有

^① (清)孙衣言:《初入观感赋》,转引自《父子年谱》之1853年。

蓝绿二本，定甫并为蓝色而失其旧，竭十日之力复加校正，而别识其异同者于下方，以资参考。又稚存原笔似亦有误笔，而定甫初录方评，间或假手抄胥，又恐不能无失，恨不得两原本及梅伯言本更加细勘也。咸丰丁巳（1857年——笔者注）二月十八日，孙某又记于澄怀老屋。^①

因上《御戈之策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坚持主战言论，孙衣言在咸丰八年（1858）六月被外放为安庆知府。此后，虽然因为座师曾国藩的赏识，断断续续担任了几省的知府、布政使、按察使等职，但从此已被排除出政治权力的核心。

同治二年（1863），孙衣言出任庐凤颖道，并逐步升任为江宁盐巡道，江宁布政使，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湖北布政使等职。但其行事为官，始终带有很浓的书生气。即使在与自己甚为相得的两江总督马新贻手下任江宁布政使时，也时有压抑之感。他在致曾国藩的信中相当详细地表述了这种淡于官场进退，始终不忘治学的心情：

某某在此，都无建白，惟私心所存，时以辨别邪正，力遏浮竞为主，而亦殊未易言。衰态易增，须发之白更甚，虽往往乘间读书，而文字几于尽废，可谓两失之矣。两宋文士往往有外历监司，卒以馆职致仕者，以某之不才，如有此遇，即当拂衣五湖，从我所好，岂遂后世无此度外之事乎！谷帅在此，持重有体，嗜好之正，实乃天资过人，可为地方之幸。而苦于求取太多，无复余力以待地方缓急。^②

① 孙延钊：《父子年谱》之 1857 年。

② 孙延钊：《父子年谱》之 1870 年。

光绪三年(1877)二月,为人刚正的孙衣言与骄倨总督不能相合,从湖北布政使调任江宁布政使。到任后,时常与两江总督沈葆楨意见相左。沈的主张是借用洋款,多办洋务。孙衣言则认为,办洋务要等国库充实后量力而行,尽量不用洋款。而且,沈葆楨“喜用健吏治命盗重案,一切用峻法,不甚究其情”^①。候补道洪汝奎见上司如此,望风行事,审案时专事刑杀,孙衣言好言相劝,因而与洪氏也产生了嫌隙。也是合该有事,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沈孙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明朗化。其一是,当时江宁有一桩命案,洪汝奎受沈葆楨之命,负责审理。洪的做法则是“捕路人锻炼定狱”。作为沈氏属官的孙衣言在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向沈作了紧急汇报。沈没有听从孙衣言的意见,径直按照洪汝奎的结论行事。其二是,沈葆楨又听信略懂天算的周某的撺掇,打算制造不用蒸汽机单凭地球引力就可行驶的轮船,要求孙衣言支付库银 3000 两。孙衣言不信周某有如此神力,再三劝阻沈葆楨,但后者的做法则是“强令予金”。后来轮船没能造成,使沈葆楨丢了颜面,二人误解益深。加上洪汝奎的挑拨,孙衣言发现自己的处境尴尬难以有所作为,于是渐萌退意。光绪五年(1879)七月,朝廷封孙衣言为太仆寺卿,召其还朝,孙衣言以老病为由,从当年的十二月起正式引退。孙衣言虽有一腔以永嘉事功之学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但由于为人性骨鲠,终究难以见容于盘根错节关系复杂的晚清官场。

一直以来,中国文人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对孙衣言来说,仕虽不优却从未忘学。要治学先要有藏书,孙衣言深谙此中的道理。光绪十四年(1888),他建成玉海楼,作为孙家的藏书

^① 孙延钊:《父子年谱》之 1879 年。

楼,同时也是儿子孙诒让的读书之所。玉海楼和嘉业堂、皕宋楼、天一阁一起,并称浙江四大藏书楼。书楼的命名,用潘祖荫的话说就是“琴西世丈以深宁叟名其书者额其藏书楼,且以公诸后生之能读书者,其用心深厚已”。“深宁叟”即南宋礼部尚书王应麟,其著作《玉海》,意为“如玉之珍贵,若海之浩瀚”。玉海楼中藏书量很大,孙衣言曾回忆说:“同治戊辰(1868)年,复为监司金陵。东南寇乱之余,故家遗书,往往散出,而海东舶来,且有中土所未见者。次儿诒让也颇知好书,乃令恣意购求。十余年间,致书八九万卷。”^①其实,除了孙衣言提到的恣意购求之外,孙家致书的途径还有借抄私家藏本、师友赠送等。借抄私家藏本,提供最多的是归安陆心源皕宋楼和钱塘丁丙八千卷楼两家。孙衣言甚至还向翁同龢求书,得到其旧藏四库副本《许及之集》,抄录后,校勘其中错误之处,再归还翁府。

孙衣言收藏善本的目的,是“校梓以广流传”,尤其是对于优秀的乡邦文献,如永嘉学派的著作,往往“凡遇先哲著述,片纸只字罔不收拾”^②。在广求善本的基础上,孙衣言父子对大量的乡贤著作进行了精心校雠,仅从同治十一年(1872)校读钱塘丁丙所藏的明抄本《习学记言序目》后所作的附言中就可看出孙衣言对乡邦文献的重视。

松生此本,写手恶劣,视予所得两残本(明秦四麟抄本,传录明叶道穀抄本)不逮远甚。予既据松生本抄补缺卷,因以两残本互相校勘,订其伪谬,又以松生本通校一过。松生

① (清)孙衣言:《玉海楼藏书记》,转引自朱芳圃《孙诒让年谱》之186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 (清)孙诒让:《征访温州遗书约》,见《父子年谱》,第161页。

本之讹，有一条分为数条，数条合为一条，又有此条错入彼条者，文字讹夺则几不可枚举矣。幸其离合错乱处显而易见，因就两残本为之校正，残本所无，则姑以予意正之，而别为标识。予本及松生本可两存者，则但曰某作某而已。松生本抄虽不精，而两残本缺误，亦间有赖松生本订正者，以此益知藏书不厌多也。官下冗杂，几及一年，始得毕事。此书差为可读，然尚恨未获一精妙全本尽正之也。予尝为修伯言此书难校，修伯答书，言其同年海蕙田所，有影宋抄本，许为借之而远在京师，恐不可必得。今姑以书归松生，如蕙田书来，我犹当为松生复校也。壬申十月之吉，瑞安孙某记于金陵思食笋斋，是夜二鼓。^①

孙衣言在藏书校书的同时，又将大量的乡贤遗著整理刊写。或请人雕版，或自己缮写，从而形成丛书或专集。光绪八年（1882），孙衣言刊成《永嘉丛书》13种80册，其中包括：宋许景衡《横塘集》20卷，刘安节《刘左史集》4卷，刘安上《刘给谏集》5卷，林季仲《竹轩杂著》6卷，薛季宣《浪语集》35卷，陈傅良《止庵集》52卷、附录1卷，叶适《水心集》29卷、补遗1卷，《水心别集》16卷，刘黻《蒙川遗稿》4卷、补遗1卷，王致远《开禧德安守城录》1卷，清孙希旦《孙太史稿》2卷、谷诚《谷艾园文稿》4卷、方成珪《集韵考正》10卷。此外，孙衣言还于光绪八年（1882）编成《叶水心年谱》；并辑有永嘉史事遗文，成《永嘉集》内编48卷、外编26卷，并于光绪十二年（1886）撰成《瓯海轶闻》。另外，他还和弟弟孙锵鸣一起编有《东瓯大事记》。

孙衣言不仅在传统学问上功底扎实，在诗词文赋的创作方

^① 孙延钊：《父子年谱》之1872年。

面也很有成就,当时有人称道他:“气度伟岸,意态超旷,似魏晋间人。读其诗,灵气往来,清莹见骨,不屑一语拾人牙慧,是酷似山谷(黄庭坚——笔者加)而得其神髓者。”^① 还有人赞其诗中有“奇气往来”,“不拾前人一字,而自成壁垒者”。^② 其诗文著作有《逊学斋诗文抄》十卷,由俞樾于咸丰九年(1859)刻成并作序。俞氏认为其诗风格古朴苍凉,上追汉魏,近作尤似苏东坡、黄庭坚,并且“立言之体,视三百篇之大小雅为近”。其文章风格,除以永嘉学派为宗外,还十分推崇桐城派的文风。门人黄体芳在校刊《习学记言》时曾说:“吾师孙太仆先生,最服膺于乡先生水心叶公。体芳昔在左右,或语及经济文章,必为言水心。”并且,孙衣言对永嘉学派中各家的文章风格也了然于心,对其章法及得失均有精到的见解,如在谈及议论文时说:“吾乡宋时诸先生,为议论之文者,莫粹于文节陈公,莫雄于文定叶公,其次则忠文王公,说理最为平实,而文稍逊焉。文节文定,皆博极群书,而尤熟于一朝之掌故与当世之利病,宜其文之独绝。学者有得于文节,则可为欧、曾;有得于文定,则可为苏氏父子。”^③

从孙衣言的学术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永嘉学派的思想观点的推崇。除了校书刊书外,还有多种表现。其一,在文渊阁任事时登阁观览温州乡贤遗著,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永嘉学派的著作;其二便是喜与方闻之士谈论当时的汉宋门户之弊,并对当时清儒纠缠于汉宋门户之争而嘤嘤不休的局面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不该有什么汉学宋学之分,而要革除两者的藩篱,只有采用永嘉学派的观点。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与朱熹的道学、陆九渊

① (清)刘存仁:《岷云楼诗话》,转引自《父子年谱》之1855年。

② (清)符葆森:《寄心庵诗话》,转引自《父子年谱》之1856年。

③ (清)孙衣言:《永嘉古文词略》,转引自《父子年谱》之1883年。